

■生活质感

江湖人漂流

□任美庚

他告诉家人,将出门漂流一趟。为什么?!他听出反应的罕见,有个惶惑不安的问号,还有个劈头盖脸的叹号。只怨自己未说清楚,便解释,“漂流”并非非常意义上的人生状态,亦非漂流达人时有失踪、遇难的探险,仅仅是一项性命无虞的水上运动。

家人回过神儿来,旋即询问行程的种种细节。眼下出门在外,阴阳交错的不友善,越来越普遍。家人的疑虑,半点都不多余。他于是引经据典说了一段话。夜郎自大与黔驴技穷,这两句贬义成语,就剑指此行目的地。然百年、千年以来,该地民众,任人笑谈,如闻耳旁之风,迄无非是之徒,以“地域歧视”为由,喋絮抗议。结论是,投身如此豁达、自信的族群,必会一路顺风。

空中航线与高速公路联手,六个多小时,便让他从渤海岸边,移身于黔东南崇山峻岭间的杉木河。二十多年前,一帮时尚青年,筚路蓝缕,跋涉寻觅,惊见此河。整装试水,一漂成功。年复一年,杉木河以他处不及之诸般优良,声名远播,牢牢奠定其“华夏首漂”的宝座。

接踵而至的电瓶车,将一律短打扮的男女老少,送抵漂流起端。一条橡皮艇可上两人,胆大者只身独漂,会被同意。岸边司职指点的水手,个个面容和善,逐一检视,救生衣穿戴稍有草率,毫无通融,扣艇不放。

码头这一段,河面宽约二十来米,流速从容,几乎无人踌躇,雀跃登艇。多为异性结伙,好照应,兼有趣。当然,两雄共舞,双雌齐飞亦不在少数。他的艇友,曾于别地漂过,新老搭档,令人心安。坐定之后,仰身望上,两岸峭壁高耸而紧凑,白云蓝天只是一条不规则的窄

条儿。平时都知道,人之吸氧,均在无知觉间。可此刻分外奇异,氧气居然带着又鲜又嫩的味道,扑鼻而来。扭腰一捧清水入口,同样的鲜与嫩,会在周身穿行。

离开码头不久,皮艇碰碰颠簸起来,不远处,出现一个由水势落差形成的浅滩。倏忽间,皮艇顺流而下。前边一只艇上,撩起惊喜的尖叫。异响似乎成为某种挑逗,河流即刻还以颜色,炫技般露出撒野的本相。一个水滩,又一个水滩,前后的尖叫开始变味。滩与滩的间隔,愈来愈短;滩与滩的高度,愈来愈玄。水流轰然声中,怪石交错,蛮横挡道,皮艇拦腰撞击,再即将弹回,多番重锤,反复摔打,酷似可怜虫惨遭群殴。前后左右,频频人仰马翻。

艇友果是老练,吩咐他蹬腿坐直,紧扶艇帮,而勿有其他举动。多数皮艇翻掉,皆因操作过度。欲与水势作对,就必遭落水下场。这伙计话音未落,惊涛骇浪中,皮艇悬空翻转,对方“哇噻”一声,只叫出一半,两人已脱艇而飞。这架势干脆之至,不问青红皂白,所有来客,概无商榷,咣当一下,扣进一口沸腾的水锅。

待他浮出水面,用脚一够,潭深无底。此时此境,于“旱鸭子”而言,救生衣便是绝对的护身符。稍后现身的艇友,享受般地腾挪着,兴奋无比:你说,你说,是不是翻了更痛快?千真万确,成了落汤鸡,有了透身爽,体内似乎开始漫溢出漂流的奇妙。皮艇开拔之后,身份、地位一笔消解,挨撞、呛水,人人平等,均需“亲自”,旁人无法代劳。他忽生怪念,如若有谁辞世心切,不妨选择漂流式投河,体体面面的断送,既无自尽痕迹,反倒挥洒出悲壮。

二人翻身上艇,竟有些乏了。皮艇懒洋洋地漂着,可看出河也累了。拐过一个几呈直角的弯道,水面甚宽,一列老少招手吆喝。临近方明白他们殷殷呼唤,是迎候上岸用餐,腹中其实早就饥肠翻动,添加粮草可谓恰逢其时。只可惜这些游击餐摊,选址欠缺推敲。艇上男女,纵使富甲天下,此刻亦会身无分文,现钞、银行卡之类,均锁存下游终点。又设想,即或有法支付饭钱,湿淋淋的衣裤,裹缠毕露的身架,山民围观之下,谁又有本事,将山珍、河鲜吃出坦然和愉快?

虽无口福,不必遗憾。一段平顺的水路,可作精神补偿,小波微澜,聊以休闲。河水流出悠悠节奏,但觉柔情甫去,诗意又来。之前二十多华里的汹涌澎湃,当然尽可抒情,但种种猝不及防,往往让人别有专注,即便化作诗行,无非类似较劲的口号。

“瞌睡虫们,天快亮了!”忽听岸上水手高喊,一语双关。惊觉过来,四下环顾,静静移动的皮艇上,坐姿甚少,多为睡相。斜阳暖身,闭目假寐,实在选对了地方。转瞬水声哗哗,到得跟前,果然“天亮”,远处的河堤与建筑,露出终点端倪。约达千米之遥一段河床,以延绵始终的坡度,鬼斧神工,谱写出活蹦乱跳的漂流绝唱。左冲右突的水流,臻于左右逢源,让每艘皮艇,不分尊卑高下地,收获乘风破浪、逢凶化吉的快感。俭约又奢侈的漂流,端的是一项高级运动。无惊无险没有意思,有惊有险才有意思;险到夺命没有意思,惊到落水才有意思;距离过短、浅尝辄止没有意思,水程适当、余勇可贾才有意思。而杉木河,竟然如此深潜漂流真谛,表现优秀,分寸可人,一切恰好。

终点码头,刚刚同舟共济的水上健儿,迅速“相忘于江湖”,四下散去。广告牌图文并茂,期望凯旋的人们铭记杉木河洗礼,欢迎岁岁重温,以助推迎对人生激流的豪情。空气里,布满肉肉烤熟、薯类蒸透的香味。他一概忽略,第一时间领出手机,禀报平安。

远方那头,竟无多话,连声“好、好、好”。他不知道的是,自“浪子”启程之日,就开始忐忑漂流的家人,这下也靠岸了。

■土地与生长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河流,这河流或许因为水流湍急,使人们无法到达对岸。此刻,当我站在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村毛主席东渡的渡口,眺望那黄河之水从眼前缓缓流过时,我怎么也无法想象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机关是如何渡过黄河的。时间老人假如存在,我会问他:当年的红军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诗人说:红军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牧羊人说:红军从黑暗中来,到光明的地方去。佛家说:红军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这就如同我,我从一条东渡船来,从一个女子对领袖对红军的情感而来。曾几何时,这条船被淹没在黄河岸边的一片山谷中,四季风侵蚀着经年岁月,却没有伤透这条船的筋骨。当地的老百姓习惯把这条当年毛主席坐过的船称作“一帆风顺”,也有人把它比喻成“龙船”。

我见到这条龙船,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夏日午后,在西安美术学院大门南侧的荞麦园美术馆。

我原以为,荞麦园美术馆无非是个占地只有百八十余平方米的小展室,里边挂着一二十幅字画以及陈列着一些石头玉器物件儿。当下,有很多的老板在自己的公司会所建有大小不一的艺术馆。然而,等我真的走进荞麦园美术馆,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这座可称为世界之最的八九米高的仿窑洞式建筑,面积总有1000多平方米,四壁挂满中外名人字画,也有很多诸如黄土土地系列的主题画作。我不知道西安市有多少座美术馆,但我敢说,荞麦园美术馆肯定是独特的一个。我对传奇的荞麦园美术馆馆长荞荞不得不刮目相看。

参观完美术馆,荞荞把我们带到一神秘处,说要让我们看她的镇馆之宝。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藏家都会拥有一两件自己稀罕的物件儿,有的是古玩,有的是字画。荞荞不说,我还真猜不出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啊,一条大船!”借着午后刺眼的阳光,我被眼前呈现的一条七八米长的木船惊住了。走到近前,只见船头的下方写着“东渡船”三个字。我问荞荞,这东渡船是什么意思?荞荞说,这条船是她从陕北老家搬来的,可不要小看这条木船,1948年3月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800多人东渡黄河到山西就是坐的这条船,当时荞荞的爷爷就是老船长。

这条船太神奇了!听着荞荞的叙述,我的双手不由得轻轻抚摸起船儿来。说来也巧,我背的帆布书包正好是印有毛主席画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那种军挎包。一旁的荞荞说,你可真神了,想不到你竟然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请回来重新坐龙船。我说好啊,于是我把书包背正,坐在船头,和荞荞一起照了一张合影。

离开龙船,我问荞荞:“你爷爷还健在吗?这条船为什么能保存得这么好?”

荞荞指着墙上的一张毛主席东渡黄河的照片说:“主席身后的那个船公就是我家爷爷,他早已去世了。爷爷去世前,一直惦念着这条东渡船,他特别叮嘱我们这些后辈一定要保护好。”

“东渡船看来是你们薛家和川口人的一种情结,其中既有对领袖对红军的无限深情,也体现着陕北人的淳朴、善良、重情重义。其中,也包含着一种信念!”

对我的话,荞荞没有接茬。我知道,在陕北人的心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是啊,自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东渡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养育他和红军13年的陕北。对于陕北的人民,是个莫大的遗憾。

“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去你的家乡到毛主席东渡的地方去看看。”我对荞荞说,也对自己说。

“好啊,红色的孩子游览红色的圣地,这本身就充满神奇。”荞荞说。东渡,东渡,何时我能到川口的毛主席东渡的渡口呢?

回京不久,恰逢一个作家采风团赴延安、榆林采风,我二话没说表示一定去。到达绥德、佳县后,在白云山参观空腔,我查看了一下地图,发现此地距东渡渡口只有几十里,于是我就对当地的朋友提出,能否让我到吴堡川口毛主席和中央前委机关东渡渡口去看看。那位朋友说,渡口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有一块不大的纪念碑。“不,哪怕只有一块石头,我也要去看!”我坚定地说。见我如此,朋友便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奔驰,两边的山崩上长满了枣树、谷子和土豆。五六年前,我曾到延安的延川乾坤湾去采风,那也是一个枣儿即将成熟的季节,回来后我写了散文《乾坤湾的枣林》。我们陕北的土地很贫瘠,只能种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司机见我那样的热爱陕北的黄土,他一脸淡然地说。

“你们这里不是有很多的油田、矿山吗?”我不解地说。

“是有,那也是富裕了一些人,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沾光!”

“除了种地,没有别的收入吗?”

“没有,一般靠年轻人到外边打工。”

“今年的大枣看着长势还不错。”

“那您可真猜错了。”司机把车放慢了速度,“这两年不知怎么了,这枣就是不结果。”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我们北京郊区也有大小年之说,是不是赶上小年了?”

“不是。据说与大面积的放蜂有关。”

“蜜蜂可以帮助传粉,应该是好事啊?”

“那也不一定,蜜蜂都把糖采走了,枣儿还怎么长?”

“看来还真得请有关的农林专家看看,说不定蜜蜂是冤枉的呢。”

聊天中,黄河已然浮现在眼前,顺着黄河的西岸,我们一路前行。大约走了20分钟,隐约看到川口的路标。司机说:“东渡渡口就要到了。”

到了,东渡,东渡!黄河,我终于来看你了!

夕阳西下的黄河缓缓地流淌着,远山近景,构成一幅陕北的秋天图画。我静静地伫立在“毛主席东渡纪念碑”前,深深地躬下身去,四处静悄悄的,我的耳畔仿佛传来《黄河船夫曲》高亢的歌声: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道弯哎?几十道弯上有几十只船哎?几十只船上有几十根杆哎?几十几个船哟嘴来把船儿搬……

川口村并不大,也就上百户人家。站在东渡渡口,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么多的小岸口,在两天的时间突然要集结上千人,硬要靠几条小船把那么多人运送到黄河对岸的山西去。据文字记载,当毛主席坐在船上准备东渡时,他突然对警卫员说他想游过去。这话虽然有玩笑的成分,但从后来毛主席畅游长江、大海来看,他是不怕黄河的。

我走到一个高坡坡上,给远在西安的荞荞拨通电话,兴奋地告诉她,我现在就在她的家乡,在毛主席东渡的渡口。荞荞说,你往西南的山梁梁上看,那里有我家的窑洞,院里矗立着一棵高大的槐树,四周全是枣树。我按荞荞所说的方向望去,由于有阳光的照耀,山梁梁的景象斑驳可见,那些建在山崩峭间的窑洞点缀在茂密的枣林中,有的人家已经开始炊烟缭绕了,如诗如画。

荞荞叮嘱我,到一趟东渡渡口不容易,要多照几张照。我当然要照几张照片了,可是当我用镜头对准渡口纪念碑、黄河、对面的山西以及满山的窑洞树木时,我发现我的镜头有限,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把我心中的东渡照出来。

夜幕渐渐降临,司机提醒说,我们该回去了。我抬头看了看荞荞的方向,我多想到她从小生活的地方去看看啊。荞荞告诉我,自从她父亲去世后,除了清明,她已经很少回家了。人没了亲人固然伤感,但如果连故土也没了,那就更伤感了。写到此,我豁然明白荞荞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把东渡船从老家的山坳里搬到西安城里的荞麦园了。

几天后来延安,当地文化部门的朋友请我们晚上观看大型音乐会《延安颂》。我问,是中央歌舞团来延安慰问演出吗?朋友回答,不是,是当地一位企业家投资的一个民营剧团的演出,每天晚上都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由于晚饭时间延长,我们走进延安大礼堂观看演出时,演出已经开始了。借着台上的灯光,我双眼走进了一下剧场,估计也就七八十人,上座率不足六分之一。尽管如此,演员们表演得依然很认真。那熟悉的舞蹈与歌声,让我又想起了中央红军在陕北的13年。与人民贴心的红军,与红军亲如一家

的陕北人民,光芒万丈的延安精神啊!我同时在想,这样的演出如果放在北京,每天的观众也只能有百八十八人吗?据我所知,北京的演出市场异常火爆,每天都有二三十场,观众上座率很少有低于80%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在文化人群分流的今天,我们不能要求电视、剧场每天都上演红色剧目,更不能强求每个观众每天都必须看红色经典。我可以总之,这些美好的作品还是能够被更多的人铭记为好。但怎样才能做到,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东渡,东渡

□红孩

黄河口草场

□张殿武

黄河水赶到这里已经很浅了,很静了。几乎没有声息的黄河,远远不如它身边的这片草场活跃。

是谁喊住了我?是谁让我的脚步停下?

是那草场吸引住了我。

那片似乎没有边际的草场,有海里的风来,它就是一堵吹不透的大墙,有天上的雨来,它就是覆盖大地淋不湿的一蓬硕大的衣盖。风暴潮袭来时,它就是静谧的港湾,汛期的大河和涨潮的大海撕咬时,它就是一支闲泊的老船。

是那草场吸引住了我。

芦苇生在水间一片连成一片,像另一个海;随风吹来,随水漂来的外乡树种,长大突兀成招摇的风景,像一群群守护者;大胆的游鱼自由地穿行在泥草间,顽皮而任性;天鹅或野鸭不时从草间出没,高纵或低旋总离不开那个风雨飘摇之所……

是那草场吸引住了我。

那腾空燃起的簇簇狼烟篝火,可是当年武圣传家的用兵之道?睿智多谋的孙武利剑一挥,正进行着一场聪慧诡秘的布阵!秦王世民东征的铁骑踏碎宁静,那副副作响的草间,可是当年掩藏着彪悍勇士,正等待着一场有备而战的厮杀?苍苍黄水一路奔涌一路洒尽泪和歌,终于在入海口完成最后的注解。天地和韵,风雨交响,繁盛出一片浩浩荡荡东部大草场,大文流、小孤岛、神仙沟、一棵树……这些草场姓氏蕴含着黄河不朽的迁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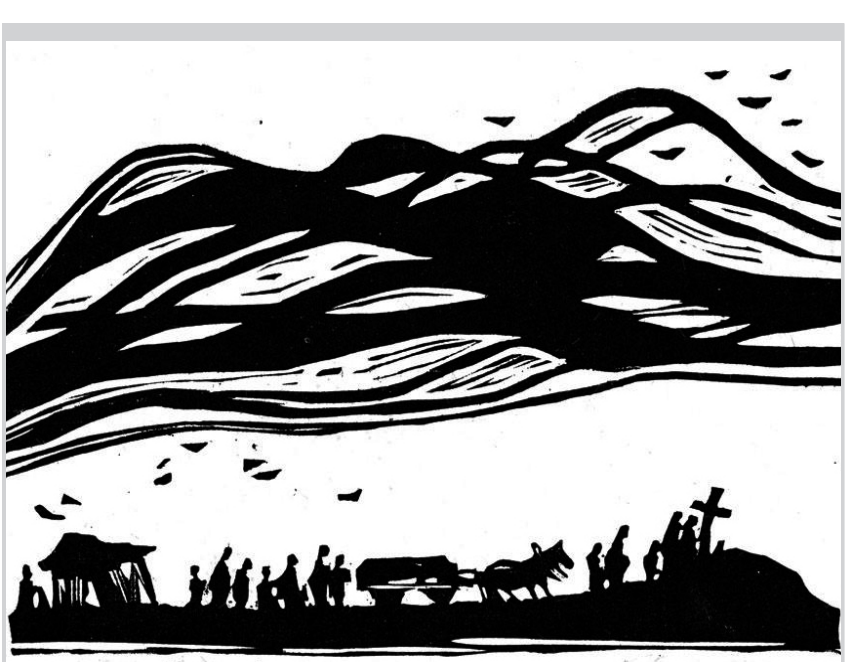
是那草场吸引住了我。

远嫁的新娘临行还张望着青草隐没处没有主人的羊群,牧牛少年爬上草场高岗,眺望美丽变幻的远处的天空,割草的老人一个动作复制一生,一个草窝徘徊一生,有割不完的草看不到边的草,总是满怀欣喜。

我抓一束草叶折几茎草秆采一把草籽,放进黄河,祈愿它漂流传播,落地生根。

是谁送我过河的是谁送船家出海的?

是那草场忽然吸引住了我。



应天齐木刻版画作品

原上草

第236期

■纪念

蓝衫布履 书生本色

——忆曾文渊

□陈再钧

曾文渊同志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众多知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之一,长期活跃在文学领域,是一位毕生致力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学者。

和曾文渊相识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文学报》正在筹办之中,我在总编辑办公室,他主持理论部工作。《文学报》的即将问世,引起了文坛和相关方面的关注。事实上,《文学报》正式出版前夕,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已有各种风声和议论。面对文学艺术界各种思潮的纷争,作为报社理论部领军人物,曾文渊必须认真辨别和准确把握,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况且那时他的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一大堆事仍需他处理,无奈他只好两方面兼顾,十分辛苦。

随着《文学报》的创刊及逐步发展,曾文渊正式调入《文学报》,继续负责理论部工作。初创时期的《文学报》工作很忙,要组织一批高质量、有社会影响、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好文章,不是一件容易事,为此他不辞辛劳,亲自赴北京等地拜访文学界要人,多方联系组稿。那时的交通与通讯远没有今天这么便捷,为一篇稿子来回折腾是常有的事。他事业心强,从不诉苦。

自从曾文渊正式调入《文学报》后,我与他的接触和交往也慢慢多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上海从事文艺报刊理论编辑和文学评论、研究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叶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小组就有文渊。他执笔的章节就包括《文学评论》这一章。这本书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及80年代前半期,曾被大学文科用作教材,有很大的影响。

曾文渊很勤奋,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很多评论文章。他主张社会主义文学要有各种不同流派,著有文学评论集《小说风云》《文坛风景》,散文集《文苑旧事》,以及散见于报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批评和自我

批评中前进》等数十篇有较高质量的评论文章。如评论刘白羽、杨朔、秦牧散文的《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与文学风格的多样性》,讲的是社会主义文学在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而且应该有多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文中观点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常被人提及,为《当代文学研究丛书·刘白羽专集》所收辑。再如《文学流派应当发展》一文,是新时期以来较早谈论文学流派的文章;《谁家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文艺报》发表后,被其他报刊摘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发表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所收录。

1981年春节过后,曾文渊和全国19位中青年评论家在北京参加了由《文艺报》举办的为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活动而作准备的中篇小说读书班。2月12日,读书班听了周扬不久前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是为学习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而召开的。周扬在座谈会上谈了五个问题:一、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问题;二、学习要结合实际,总结经验;三、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的形势;四、关于创作自由、批评自由与艺术民主问题;五、文艺单位的改革、调整问题。曾文渊洞察时事,认为周扬的这个讲话精神很重要,应在即将创刊的《文学报》上首先公开发表,以论谈者。因为是录音讲话,很多地方录得不清楚,很难按原样整理出来,所以他只能和其他同志对笔记,择其要点,采用问答

形式,费了很大的劲整理出来,并加了主标题“文艺工作者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副题是“周扬同志就当前文艺工作答本报记者问”,然后专门拜访问晤周扬,当面请教交流,彼此相谈甚欢,并呈交访谈录请他审阅。随后他与周扬秘书多次电话联系,得知周扬很忙,并回答这个谈话《文学报》单独抢先发表不好,要发表的话将来统一安排。于是他的努力只能就此而止。过后不久,杜宣访途途径北京,碰到周扬谈及此事,周扬谦虚地说,他那次讲话讲得很零乱,整理成那个样子很不错,还对整理者夸奖了一番。杜宣同志从北京给报社同志写信时提及了此事,从杜宣的信中可以看出,周扬对访谈录是首肯的。他之所以不同意公开发表,主要是从当时文艺界情况考虑的。有关这个访谈录的全部内容,已收入曾文渊的《文苑旧事》一书中。

我曾拜读过曾文渊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评论集《小说风云》。他的《透视和描绘复杂的人生》一文,以精辟的论述对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随后的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中,《人生》果然得奖,由此可见他眼光的锐利。曾文渊的评论文章十分注重对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作思想的把握,注意将作品放在作家创作思想的发展和创作道路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他的《相知·相识·相重》一文,论《保卫延安》和冯雪峰的评价,1983年6月9日在《文学报》发表后,杜鹏程两次写信给他,说文章“写得事实准确,见解深刻,而且挺有感情”,“是好文章”。同样,他的《八十年代上海风情录》一文,评程乃珊中篇小

说,条分缕析地论述,既充分肯定小说的四个特点,同时善意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她创作上的弱点,如生活面较为狭窄、视野不够开阔而带来问题不够准确等。程乃珊见文后,即电告文渊:文章写的很实在,同意所提意见,表示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文渊著文严谨,他不是那种像鲁迅先生说的“以为一做评论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更不是轻率地“速成和乱评”之类。他常与我谈起,“搞创作要有独创风格,搞评论要有独特见解”。

文渊人缘好,口碑佳,文脉广。著名学者王元化信任他,把不少文稿和资料拜托他整理。林默涵也赏识他,从北京来电表明自己的文稿由曾文渊改定即可。在我的印象中,原《文学报》编委的一些老领导都知道文渊的才华,亦倍加器重。

曾文渊年长我十几岁,是我敬重的老师,可他却从不这么认为。他谦虚地对我说“活到老,学到老。都是老师嘛,相互学习”,坚持不让我称他为老师。我无奈只能直呼老曾,他很高兴,亲切地叫我小陈,我感慨万分。我自知学疏才浅,腹内空空。平时读书看报遇不解之处,请教的老师就是文渊同志。

曾文渊任《文学报》副总编辑,当了领导他更加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本色不变。一切应酬场合均与他无关,埋头工作搞学问是他的习惯。他是《文学报》元老,对《文学报》有深厚的感情。晚年他身体一直不好,疾病缠身,长期住院,但他仍关心和热爱《文学报》,不时对报社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与有益的建议。作为厦大的一名学子,母校永远在他心中,每露出及便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言语中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感恩。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和曾文渊从相识到他离世,整整33个春秋,风雨雨品,点点滴滴,言犹不尽。我敬仰他的人品、文品和学者风范。我想起同事陆梅为他所作的挽联:“一生简朴书生本色系文坛,两袖清风蓝衫布履履风景”。